

59个，资本254128万元（金元券万元折1银元。资本数不含丰惠、小越），从业人员2580人，恢复至抗日战争前水平，其中丰惠镇有从商600人，百官镇358人，崧厦镇319人，章镇287人，东关镇824人，小越镇192人。城镇人民就业机会又较多。

二、造纸业

民国时期，本县南乡（下管）一带，盛产溪屏纸（俗称“霉豆”纸），是本县的大宗出境产品，年产纸3万担左右。但生产工艺原始，质地粗劣，概以当地嫩竹为原料，经捣料、浸料、生腌、蒸煮、调浆、附帘、烘干、整理等八道工序方可上市，生产周期长达两个月。此类生产亦以家庭为生产单位，最多雇佣1至2人。民国27年（1938年），全县有槽户54户，槽桶108只，资本5.72万元，从业人员324人，年产纸2.54万余担，总产值为12.7万余元，产品销往宁绍平津等处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交通阻塞，销路不畅，产量日趋下降。民国35年（1946年），全县从业人员减至250人。此后，溪屏纸生产在现代造纸业冲击下，销路愈差，到1949年从业者已寥寥无几。据1951年统计，全县从事造纸业者仅存31户，雇工22人。

制 三、茶业

上虞制茶业历史悠久，稍有名气，其中尤以章镇为最，下管次之。清光绪九年，即有章镇“源裕”茶栈，精制箱茶，运销国外，获利甚丰。

民国16年（1927年），全县有茶叶工人4000余人。民国23年（1934年），章镇茶栈发展至10家，年产箱茶2.4万箱，其中嘉泰、义兴、济源、开泰、兴记、源昌茶栈年产箱茶均在2000箱以上。民国28年（1939年）全县有茶厂14家，雇有常年性职工224人。每逢制茶季节，各茶厂临时雇工不下200人，从每年5月到8月底，历时4个月，为当地人民提供了就业机会。日本侵略军占领上虞后，茶厂多为倒闭。

民国36年（1947年）全县茶厂恢复至7家，但规模、产量均不如前，从业人数下降。

四、搬运业

清朝末期至民国时期，全县搬运业日益发展，不少无地少地的贫民以搬

运扛挑为业，出卖苦力。随着商业的发展，为货主代办货物中转、装卸、托运等业务的私营运输行业和过塘行应运而生。清朝道光年间，曹娥设立的“陈正和过塘行”至光绪年间成为曹娥31家过塘行的总行。

民国时期，过塘行增多。民国25年（1936年），全县登记在册的过塘行达63家，其中百官大坝头“通运协”，丰惠镇“老通明”、“洽盛”两家过塘行资本均在1000银元以上，各雇有职员3至2人，生意兴隆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各业萧条，货运减少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各业复苏，水陆运输量剧增，复兴和新设的过塘行增至82家。因而在1946年6月2日成立了“上虞县运输商业同业公司”，同年又分别成立“绍兴县曹娥镇脚伙业理事会筹备委员会”，“章镇挑挽业理事会”和“上虞县梁湖坝挑挽业理事会”，全县有“脚班”14个，搬运工人2264人。

从事搬运的人员自己组成“袋头班”，“老酒班”等业务“脚班”，由“脚头”（或称班长）主持搬运业务，分地界承揽过塘货物。当时“脚班”的搬运业务大多须经过塘行承揽推荐，而过塘行从中牟取一定利润。因而，工人累断腰骨，劳动一天所获，除受过塘行的盘剥外，还要受“脚头”的一成克扣，其收入微薄可见一斑。民国末期，坝头费用提取由挑力费的5%提高到15%，搬运工人生活更为艰难。民国30年（1941年），中共党员上海复旦大学学生朱铁晖在百官大坝头组织工人罢工，为增加工资，改善工人待遇开展斗争。

五、近代工业及手工业

上虞因经济不发达，故清朝末期至民国时期近代机器生产工业基础十分薄弱，发展缓慢，城镇民众就业者甚少。民国初期，甬绍商绅实力人物来虞创办实业，本地士绅亦合股办厂。但规模一般较小，行业狭窄，只有棉织、电气、碾米、印刷、化工等业，总计不满10家，从业人员不足百人，且随政局变更，市场经济的兴衰，时歇时办，工人谋得一份职业，也是朝不保夕。如棉纺织业，民国12年（1923年），小越镇即由旅甬巨商罗仲符创办华通织布厂，历经三载，工厂职工不下百人，轧扎之声，旦夕不辍，可谓兴盛。但好景不长，很快萎缩而倒闭。民国21年（1932年），全县仅有工厂4家，从业人员55人。其中最大一家官商合股经营的“平民工厂”，设备曾有铁机6部，木机12部，雇工40人，年产席法布2040匹，年产值14.4万银元，创办6